



改革收入分配, 破解高储蓄率困境

潘洪其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 中国储蓄率从2000年的37.6%提高到2011年的51.8%, 明显高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 更高于发达国家; 同期消费(尤其是国内消费) 一路下滑, 其在GDP占比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1年的49.1%。

近年来, 中国储蓄率持续走高, 消费增长却相形见绌,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现象。究其原因, 无非一是居民收入总体偏低, 因此不愿多花钱; 二是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长期不足, 居民不得不对未来进行“预防性储蓄”, 因此不敢

多花钱。专家开出的“药方”, 也是一要提高居民收入, 增强消费意愿; 二要增加公共财政对民生的支出, 加大民生保障力度, 帮助居民增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降低“预防性储蓄”意愿, 等等。

上述原因及“药方”, 已算不上特别专业的高论, 一般人多少都能明白个中道理。不过, 有关报道揭示的另一层关系, 却似乎不大为人所知——近十年来, 中国居民储蓄占国民总储蓄比重呈下降趋势, 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占国民储蓄比重不断上升, 中国的高储蓄率有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和

企业储蓄高导致的。原来, 储蓄、轻消费不但是多数居民的普遍倾向, 也是政府和企业的普遍倾向, 并且这一倾向在政府身上体现得更明显。而政府消费不足, 主要表现为公共财政对教育、卫生等民生领域的支出不足, 居民因此不能享有充分的社会保障, 不得不进行“预防性储蓄”。这就与居民“不敢多花钱”的原因对应起来, 表明居民储蓄率高与政府储蓄率高有着内在的关联。

简单地说, 国民收入主要在政府、企业、居民之间进行分配, 中国储蓄率居高不下, 主要是由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特别是政府储蓄) 较高, 足以反证政府和企业(特别是

政府) 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较大优势。这种收入分配“强政府弱居民”、“强资本弱劳动”的失衡态势, 反映了长期以来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偏低的问题, 这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内在地需要普通居民提升自身素质, 以提高自己作为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含量。但是, 我国劳动力供应相对充裕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单靠市场机制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难度较大。在市场作用之外, 政府应向居民提供

职业培训和就业支持纳入基本公共服务, 帮助居民通过提高素质和技能来增加劳动报酬; 同时要履行指导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职能, 推动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 通过严格劳动执法, 协调劳资双方的公平博弈, 帮助劳动者提高劳动报酬。

收入分配改革的另一项任务, 是要在再分配中改变“强政府弱居民”态势,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要求政府合理运用累进税率、提高个税起征点、结构性减税等税收手段, 将高收入阶层的部分收入转

化为普通居民的“收入”。更关键的是, 政府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增加在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的消费支出, 人大和社会公众要加强对政府预算的监督, 严格落实预算对政府支出的法律约束, 大幅度压缩包括“三公”经费等行政经费, 将更多政府收入转化为普通居民的“收入”。

为此,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与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多方面改革紧密结合, 强化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制约, 真正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才能建立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有效破解“中国式高储蓄率困境”。

茅台还有“故事”

凌河



一瓶茅台, 总有“故事”, 说是红军四渡赤水, 扎营茅台, 靠着茅台的酒, 才洗净了百千伤员的伤口, 又说当年过雪山, “雪皑皑野茫茫”, 身着单衣的一方面军, 靠着从茅台带去的酒, 才能御寒北上, 所以说小小一瓶茅台, 居然“对中国革命有功”。到了近时, 茅台又有故事, 要么涨价涨到天上, 要么如这时节, 天价跌去一半, 几乎近了谷底, 什么原因呢? 因为“八项规定”, 因为“禁酒令”。

其实关于茅台, 还有两个“故事”, 茅台人不知道, 但人民却没有忘记——

一是说改革开放初期, 小平同志9次到上海过年, 住在西郊。小平同志有一个“喜欢”, 喜欢同家人一齐吃饭, 欢声笑语, 其乐融融; 小平同志又有一个“爱好”, 每顿饭要喝一小杯茅台, 那是他的“特权”, 儿女孙辈们是没有喝的。但小平同志更有一条规矩, 那便是每次离开西郊宾馆的前夜, 卓琳同志都要把伙食账结清, 饭菜荤素, 一一付清, 包括那每顿“一小杯茅台”, 从不短少一文。

二是说70年代末, 李葆华同志主政贵州, 曾到茅台视察。临走的时候, 茅台酒厂偷偷在他秘书的包里塞进了两瓶茅台。李葆华同志回到贵阳才知道这件事, 脸红耳赤地批评了秘书, 并严惩退钱。不料那几天, 正是茅台涨价, 李葆华同志坚持按照新价退了酒款, 并看过那张汇款单才罢休。

这两个“故事”, 都是有关茅台, 现在在酒桌上谈起, 在座的人都认为“恍如隔世”, 更觉得“匪夷所思”——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小平同志给中

国人民带来了春天, 他喝一小杯茅台又怎么样? 但是小平同志有过一句名言, 人民已经给了我们“俸禄”, 我们不能再多占一口, 所以他连“一小杯茅台”都要“付清”。而为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 李大钊同志连头颅都献了出来, 他的儿子兜两瓶茅台又算什么事? 但李葆华同志却感到“脸红耳赤”——李葆华后来当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这样连两瓶茅台都要按市价退钱的人管国家的钱袋子, 人民怎能不放心?

两个关于茅台的“故事”, 其实不是故事, 而有着振聋发聩的现实针对性。现在公款吃喝疯掉了, 喝着茅台涨到了天价, 便是“八项规定”之下, 有的“司长”还是顶风吃喝, 躲到偏僻民宅里, 转到机关食堂内, 拉上窗帘还是要喝, 实在管不了自己那一张嘴——其实他们酷爱茅台, 好这一口, 也无妨, 甚至也可以任他放开去喝。只是喝过之后, 要像小平同志那样自掏腰包, “一一付清”。拿自己的“俸禄”去喝, 人民就没有意见, 也不会“沸反盈天”, 他们痛恨的只是一边拿着“人民的俸禄”, 一边“工资基本不用”, 从吃到喝再由“人民”包下来, 所以才这样大手大脚, 所以才如此胡吃海喝。

现在制裁吃喝之风, 药方很多, 论教育规劝, 谈严管报销, 说制度要改, 都有见识, 都很重要, 但小平同志喝“一小杯茅台”都要自己“一一付清”的故事, 却给予我们深深的警示, 也多少击中了公款吃喝的要害——“吃喝”本身并无大错, 毛病就出在“吃公”上呀。所以说这两则往事, 其实不是“故事”, 当我们端起茅台之时, 能不能想一想如果小平同志与李葆华同志在, 他们会怎么样? 而我们, 又会不会“脸红耳赤”呢?

无巧不成书

徐达内



都说红人是非多, 我们这儿是红会是非多。芦山抗震救灾把中国红十字会又推到了风口浪尖, 尤其是“重查郭美美”一事, 令这个本就身陷诸多传闻无法自拔的官办慈善机构, 更加百口莫辩。

说起来, 那些社监委里的名人提议重查郭美美传闻, 应该也就是想要让红会“翻身”, 证明个清白。可是, 白岩松、袁岳们的个人声誉终究载不动那许多怨念, 媒体评论满是不以为然, 据称有七成网民期待“晒账”胜过“查人”, 刻薄的微博用户更是吐槽“你杀了嫖客, 小姐也都没法证明你不是个窑子啊!”

应该是急了。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4月26日傍晚通过个人微博表态, 宣布“红会没有任何人说要重查”, 强调重查郭美美只是社监委委员的个人提议, 并批评“一些媒体记者见风就是雨”。

世间的事, 也真是无巧不成书, 更让王秘书长欲哭无泪的事情, 此时发生了。由于当天早些时候, 互联网上曾流传一个“郭美美代理人放出17.2G性爱视频”的消息, 相信“新闻要连在一起看才有意思”的人们迅速发挥想象推理能力, 将@王汝鹏的发言视作“红会否认要查郭美美”, 进而得出以下关联: “红十字会宣称准备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郭美美放狠话: 谁敢动她一根毫毛, 她将立即公布红十字会不为人知的腐败内幕→网传郭美美17.2G性爱视频流传→人人影视等多家论坛被封→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否认要查郭美美”。

于是, 包括一众微博大V, 可能前一分钟还在高呼“重查郭美美毫无意义”, 此时却转而高呼: “谁不许查, 谁就在那17.2G的性爱视频里!”

虽然“郭美美放狠话”这个说法根本就不成立(这个直接导致红会陷入无底深渊的小姑娘三周来从未公开留言,

类似的表达早在2月18日即发布, 声讨对象应是赌博纠纷), 而且所谓“17.2G性爱视频”从一开始就分明是个恶搞(原始发布消息者的账号叫作“东亚假新闻网”), 但在互联网碎片式的传播中, 这些足以证伪的要素都被有意无意忽略。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同时索取这17.2G的性爱视频种子——“破鼓万人捶”, 这就是当晚中国微博论坛上最娱乐至死的一幕。

在传闻的散布过程中, 常常还需要一些关键节点上的优化, 以使其更加逼真可信。这一次, 是@财经网特意修改了舆情, 声称在重查郭美美消息被报道后, “舆论反应对红会中性偏正面”。这样一来, 红会否认重查就坐实了“做贼心虚”的嫌疑。

已经很难查清, 究竟是谁第一个移花接木了“放狠话”。能显示的证据是, 搜狐手机客户端上的《4·26微博午间速递》, 曾经以“郭美美: 谁敢动我一根毫毛”之帖作为主推重点。而作为中国互联网舆论场影响力数一数二的民间意见领袖, 李开复当天深夜的跟进, 更是令诸多对红会本就心存黑幕想象的网民信以为真。

@李开复就是先转发@财经网那段含有“公布内幕”、“视频流出”描述的微博, 而后特意找出郭美美两个多月前的那段留言, 再作转发。

这种暗示误导, 对红会来说当然是不白之冤。但如果究其源头, 新闻巧合的背后也确有咎由自取的因素。红会善款运作中的粗疏、不透明——至少在2013年之前——给了那些反对者推波助澜、以讹传讹的机会。

两天之后, 针对汶川地震后百余艺术家义拍筹款“不知所终”之事, 红会紧急回应称该款转入“博爱家园”项目。虽然红会为此道歉, 但诸君请看, “博爱”二字, 又巧了, 正嵌在郭美美事件中曝光的“中红博爱”、“博爱小站”项目中间。于是, 任你如何申辩二者无关, 又难免再激起一波“无巧不成书”的非议。

五月四日, 未完成的成“人”礼

李泓冰



一位长者来函说, 能不能写一写五月四日。

是呢, 这个日子, 每年都是一个必要的提醒, 让我们习惯性地清点, 自从1919年之后, 中国都发生过什么, 有哪些完成的和未完成的。94年前, 在北平呐喊过的热血青年墓木已拱, 然而, 他们喊过的口号, 仍有穿透历史的力度, 直逼当下。孩子们教科书上背诵过的五四精神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在我看来, 五四这个文化符号的独特在于, 凸现了平民之于国家的意义——平民的呐喊, 终于迫使一个做惯了五千年的帝国向自己的“子民”垂下头颅。从这一天起, 中国人开始了从“子民”向“人民”的艰难过渡: 咱可以不再给人当儿子孙子了, 咱可以自己成“人”。

但是, 这个成“人”礼的实现, 绝非轻而易举。

感谢中国青年报, 呈现了一个芦山地震中的故事。我以为, 这几乎是呈现给今年五月四日最震撼的成“人”节“礼物”。

这篇题为《生命的天平》的报道, 叙述了一场令人绝望的拯救: 84名官兵用了120多个小时, 冒着生命危险, 依靠手搬斧凿的方式, “搬”走了一座山, 只为了寻找芦山“4·20”强烈地震中掩埋的钟灵村普通山民李安全, 最终, 李安全的遗体被挖出, 而因为“害怕损坏遗体”, 在余震的飞石袭来时, 战士们扑将上去用身体掩护, 6人受伤……

如果, 是为了一位高级领导, 为了一位科学家, 这一切还顺理成章的话, 这一次, 他们面对的只是一位山民。军队、士兵, 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钟灵村

这个小小的角落, 在山民李安全的生命尊严面前, 国家机器垂下了头颅, 生命的天平向着一个“蚁民”谦卑地倾斜。

这个小小的故事, 无愧于五月四日。

共和国的成立, 其终极意义, 就是让李安全这样曾经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蚁民”, 忽然有了当家作主、扬眉吐气的“翻身”感。搁到百年前, 我们无法想象, 会有84个兵去愚公移山, 只为发掘一具山民遗体。我们愿意用信仰去解释这些士兵的行为。信仰的内容, 是人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有资格“用”兵的, 只有人民, “蚁民”没有这个资格。彼岸《拯救大兵雷恩》的国家力量, 在四川, 被用来拯救山民李安全, 中国军人在这一刹那, 无愧于天下。

然而, 我忽然有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假设。假如李安全是在一个平常日子, 在山里砍柴时跌落重伤, 交通不便, 缺血少药, 他能否及时获救? 假如李安全走出大山, 到城里打工, 一旦工伤谁来保障他的余生? 假如李安全被一辆豪车撞伤, 会不会有人跳下来冲他叫嚷? 假如李安全扛着铺盖卷儿张皇地走在闹市, 他会不会迎接子弹般射来的嫌恶或漠然的眼光……

这些无法解开的问号, 让我们汗颜: 五四留下的呼号, 我们远未实现。

在大灾大难面前, 我们长歌当哭, 热血如沸, 灵魂净化, 守望相助。然而, 在无数庸常的日子里, 面对身边的困厄, 生命的天平是否还会向最卑微的李安全们倾斜? 我们的权力机关、医疗、教育以及社会保障是否还会细致地照顾到李安全们的利益?

多么希望, 我们能回答一声: 是。